

# 许美德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 及其核心视角探析

杨春梅, 孙孟思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许美德是国际比较教育界著名学者,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授。许美德常用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是理想类型、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 这尤其表现为她对中外高等教育比较所构建的理想类型框架, 对中国知名教育家所进行的叙事研究, 以及对中国大众化高等教育所进行的案例研究。描述和理解许美德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和思路, 有助于我们从方法的路径更好地理解当代比较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 许美德; 理想类型; 叙事研究; 案例研究; 比较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0-05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667 (2017) 12-0007-08

研究方法的探索和争鸣一直是比较教育学发展史的主旋律。每一次比较教育学学科的重大发展, 总是伴随着研究方法的突破和创新。众多比较教育学者在比较教育研究方法上卓有建树, 许美德 (Ruth Hayhoe) 即为其中之一的优秀典范。许美德是国际比较教育界著名学者,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授。作为一位外国学者, 许美德在长期研究中通过理想类型、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扎根于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 为当代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应用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范例。纵观许美德在整个比较教育研究过程中的方法探寻和创新, 在更加真切地感受一位当代比较教育学者研究之路的同时, 也有助于我们从方法的路径更好地理解当代比较教育的发展。本文将对许美德教授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及其核心视角进行介绍和分析。

## 一、理想类型的应用

### (一) 将理想类型运用于比较教育

“理想类型” (ideal type) 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所提出的重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韦伯把理想类型定义为 “是通过动态生成的观念来历史性地分析个体或者它们个别成分的特别尝试”<sup>[1]</sup>。理想类型不是对现实的摹写和描述, 而是通过把研究者认为具有典型意义和特征的因素予以强调、综合和抽象而得到, 进而成为对经验现实进行观察、分析和解释的概念工具以及认识现实的中介手段。理想类型可以用来表述一些复杂的观念, 如韦伯在讨论基督教与资本主义关系时就使用了诸如 “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天职观”和“科层制”等理想类型。

布莱恩·霍尔姆斯 (Brian Holmes) 开创性地将理想类型运用于比较教育研究, 将之作为

①衷心感谢许美德教授提供的珍贵资料和对论文初稿的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 杨春梅, 女,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教育学博士;

孙孟思, 女,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探寻不同教育体系深层价值取向的途经。他提出运用规范模式、制度模式、精神状态模式和自然模式对各种资料进行简化、分类和组合,由此形成最简单的理想类型模式,再将此模式用于问题解决法以分析问题和预测政策实施的可能结果。他通过对柏拉图、马克思和杜威等人教育思想的概述而绘制出理想类型框架,并对欧洲、苏联和美国的教育进行了比较分析,追根溯源了教育背后的有关良好社会和知识的不同观念。<sup>[2]</sup>许美德师从霍尔姆斯学习和研究比较教育。在许美德比较教育研究的不同阶段中,她多次使用到理想类型。描述和回顾这些阶段性的使用,可以从中体会许美德的认识发展逻辑,也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理想类型。

## (二) 研究进程:三个不同研究阶段中理想类型的应用

### 1. 第一阶段:基于“批判二元论”的理想类型

霍尔姆斯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使用理想类型与其致力于“批判二元论”有关。批判二元论由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他强调“事实”与“价值”的分离。霍尔姆斯将批判二元论作为对不同价值或文化体系进行比较和分析的框架。他提出学术可以进行独立分析,可以预测特定背景下不同价值选择和政策方向可能产生的结果,但回避对价值偏好进行实质性讨论。在师从霍尔姆斯学习比较教育期间,许美德的博士论文“德国、法国、苏联和美国大学模式与1911年后中国高等教育政策评价”即是基于批判二元论的一项研究,该研究确认了体现于教育制度中的文化因素,但无意进行价值判断,仅是单纯探究如何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进行比较性理解以预测未来的发展。许美德回顾了中国近百年来的教育发展,发现中国是一个在效仿西方教育和保持儒家传统之间不断抗衡的国家。基于历史回顾,在把中国历史经历与1911年以后不同时期从德国、法国、美国和苏联借鉴而来的学术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时,许美德认为理想类型是进行文化比较和探索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对变革有何影响的一个有用工具。她认为,霍尔姆斯所提出的关于人、知识和社会

的“规范理想类型”有助于确认中国现代政治史中各个阶段广泛的社会目标,而“制度理想类型”则可以用来确认德国、法国、美国、英国、苏联五国大学模式的核心价值,她还分析这些核心价值与中国传统学术机构和现代高等教育形式的互动方式。<sup>[3]</sup>

### 2. 第二阶段:基于“价值明确”的理想类型

当许美德从事博士后研究时,她试图建立一个能够对中国、日本、欧洲、美洲和澳洲的教育进行比较的框架,但她不愿再按照价值中立的观点进行比较。随着对中国大学的深入了解,她发现大学里的学者和管理者一方面有着对学术的规范性理解,另一方面也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解和行动的框架。显然,批判二元论是无法揭示蕴含其间的“真相”的。在把“依赖理论”作为有待检验的理想类型来考察历史上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教育关系与教育经历的研究过程中,许美德接触到“世界秩序模式规划”(World Order Models Project)中很多学者的研究,尤其是受到了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的影响。这些学者主张学术应该而且能够提出有价值偏好的未来发展模式。基于此种模式的“价值明确”的启示,许美德跳出当时所普遍运用的技术评价框架,即关注所输出的知识和技术对接受帮助方的有效性和影响,而是转而关注互动的过程。她借鉴使用了加尔通的理论框架,一方面关注各国不同的教育政策和实践是如何支持公平、自治、团结和参与,另一方面也关注掠夺、统治、破坏和边缘化。最终,她设定的评价框架勾勒出两种理想类型:第一个理想类型是理解中国大学发展形式在逻辑上的结果,以及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互相尊重的互动形式;第二个理想类型是解释帝国主义新的结构模式的结果,例如50年代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来自苏联的影响。<sup>[4]</sup>沿着这一连续体的两极,许美德对一些双边政策和计划进行了评价。

### 3. 第三阶段:基于“文明的对话”的理想类型

文明多样性中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在冷战以后受到重视,并越来越被认为是新的世界秩

序的思维方式的基础。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许美德就一直关注文明的对话。她试图为中国和西方世界创造一个对话的条件。一个有价值的经历是,许美德曾负责和实施一个中加合作项目,以此项目为契机,她积极推进中加教育与文化交流。通过比较两国差异,她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背景下,如何建立文明的对话?她试图建立一个框架用以比较和理解中加两个社会中大学的角色和责任,此时,理想类型再次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她提出可以把塑造两国大学知识分子生命的核心价值作为理想类型来进行确认和描述,由此获得有关自我和他人的知识,这有助于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更进一步地说,在各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面对现代性的“铁笼”和“异化”,出路在哪里?西方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了“救赎的现代性”,即用复兴的文化生活世界、复兴的道德实践和美学实践领域的知识进行救赎。如果把“救赎”视为西方精神文化的一个隐喻,那么,在现代中国它又会是什么呢?许美德发现,负责中加合作项目的中国教育学者其教育思想和学术生活深深植根于儒家人文主义之中。于是,许美德提出了,“人文化的现代性”(humanizing modernity)这一隐喻,认为这有助于当代中国社会建立起公平和真实的文化形态。在许美德看来,作为知识分子,需要更多的自我反思和更认真的倾听,惟有如此,在拥有不同文化和精神资源的人们之间才能找到汇合之处,以解决全球共同体的教育问题。<sup>[5]</sup>

### (三)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东西方价值观在东亚地区教育中的碰撞

许美德曾通过撰写《中国之谜》、《救赎的现代性》和《理想类型在比较教育中的应用:个人的反思》等三篇论文来探讨并运用理想类型这一理论方法本身。后来,许美德在《哲学与比较教育:我们能从东亚学习什么》一文中举例说明了如何运用理想类型理论来阐明关于人、社会和知识的核心价值观,并进一步探索这些价值观的异同。<sup>[6]</sup>她首先从3个比较教育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东亚教育的经验进行了反思:

作为科学的比较教育;比较教育和帝国主义;比较教育与全球化。她把每一个理论视角作为一枚透镜分析了东亚教育的经验。例如,从比较教育作为一门科学的视角看,可以发现人力资本理论(如增加教育投资)在东亚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儒家实用主义思想的适应性;从比较教育和帝国主义的视角看,可以发现东亚是各种形式帝国主义不折不扣的实验场,在殖民、后殖民和非殖民的背景下,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建设并存的条件下,欧洲、美国和苏联的教育价值观与儒家传统在这里彼此碰撞和相互影响;从比较教育与全球化以及不同文明对话的视角看,可以发现东亚成功的教育经验为全球社会做出了贡献。在此基础上,许美德提出:能够解释东亚高教育成就的深层次因素仍植根于儒家哲学关于知识、社会和人的观点。由此,她将东亚社会普遍的儒家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理想类型,与柏拉图、杜威以及马克思等人的理想类型进行比较。在她看来,儒家传统社会的内涵具体体现在一些观点上。例如,人能够通过教育臻于完美,一个个家庭构成了一个宏观的大社会,知识是通过不断从社会和自然世界中学习经验得来的。她认为儒家文化遗产最显著的特征,即是一种通过对经验的深刻反思来推动知识进步的渊博而人本的实用主义。

## 二、叙事研究的应用

### (一)将叙事研究运用于比较教育

叙事研究通常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主要的形式是描述,可以描述自己或他人,也可以通过他人来描述第三者。作为质性研究的一种,叙事形式多种多样,包括自传、传记、叙事访谈、生活故事和论文集等。许美德在进行叙事研究时,首先考察了不同学者是如何理解叙事研究的。例如,英国学者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把叙事视为一种可以克服后启蒙时代社会科学局限性和理解内在主观世界的一种方法。他认为特定的对话和一般的人类行动都是“表现性叙事”,人们就生活在叙事之中,人们以叙事的方式理解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以及行动方式。叙事具有相关性,人人都可

以通过自己和别人来描述自己,人人都互为所讲述故事的一部分。<sup>[7]</sup>加拿大学者吉恩·克兰德尼(Jean Clandinin)和迈克尔·康纳利(Michael Connelly)在《叙事研究》一书中也是从联系的角度去理解叙事的,他们认为叙事研究就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特定情境中所进行的长期合作和社会交往,叙事研究就是“去体验故事,去讲述故事”<sup>[8]</sup>。

叙事研究在比较教育中有代表性的一项研究,即是许美德对当代中国11位教育家教育经历和教育思想的叙事研究。当许美德开始着手描绘这些教育家的肖像时,发现自己的想法和《叙事研究》这部著作的内容不谋而合。她的后续研究思路即是受到该书所提及的两个观点的启示:第一,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之中,他们都不应该被视为独立的个体,而是家庭、机构、社区和国家的成员;第二,在理解生活历程时,关注时间的流动感。<sup>[9]</sup>叙事研究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运用的目标不是过多地使用外在框架仅仅去比较教育的内容、方式和方法的异同,或是用别国的理论和价值观去评判别国的教育,而是关注从故事本身寻找内在的“结构”。叙事研究的这一特点正是许美德所重视的。叙事研究正是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改变着比较教育,体现出比较教育自身研究范式的文化多元性。

## (二) 研究进程:对教育家的深入访谈

如前所述,许美德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渐不满足于霍尔姆斯的批判二元论和价值中立的方法,在她开始采用“价值明确”的研究取向后,她对中国教育的研究有了新思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作为西方学者的她可以近距离地接触中国大学的管理者和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许美德开始以当代中国11位教育家的生活、教育和学术历程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中,许美德发现儒家思想仍然是这些教育家在一个世纪中安身立命所必不可少的潜在根基,而由于时代的特殊性,相关的文献对于儒家思想的考虑甚少,甚至还有批判儒家思想的文献,这对当时的她来说并不是一个能够理解的现象。因此,她决定采用叙事研究去描绘

这些教育家的生活经历和教育主张,试图解释在动荡的20世纪中国这些教育家的生活与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去理解他们在中国一个世纪变迁中对教育的思考以及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方式。

许美德的叙事研究所搜集的资料包括:

(1)教育家对自己生活的回忆,包括家庭生活、求学经历和他们的教育贡献等;(2)教育家对建国至改革开放各个阶段中国教育的看法;(3)对教育家的学术著作进行搜集,进一步了解其学术成就;(4)对教育家求学和任教所在大学的校史进行搜集。访谈工作主要是在1997-2001年进行的,许美德对每位教育家都进行了2次以上的访谈。每次草稿一出来,许美德都会复印一份并送给每一位教育家,以便根据他们的反馈进行修改。

## (三) 研究成果:描绘11位中国教育家的肖像

许美德在叙事研究上的代表性著作即是《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这部著作由12章构成,第1章是“绘制肖像:框架解释”,第2-11章分别是“王承绪:著名的比较教育专家”、“李秉德:教学论和教育实验的开拓者”、“朱九思:有远见的大学校长”、“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奠基人”、“谢希德: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王逢贤:一位执著的教育哲学探索者”;“汪永铨:高等教育思想家和领导者”、“顾明远:比较教育家和现代化理论家”、“鲁洁:一位杰出的女教育家”、“刘佛年和叶澜:两代教育家”,第12章是“框架比较与思考”。整体来说,许美德的叙事研究是按时间先后顺序进行叙述,在中国几次大的社会变革和大学变迁背景下叙述这些教育家的生活和教育经历以进行肖像描绘。本文选取王承绪和顾明远两位比较教育家作为代表来呈现许美德的叙事研究成果,以深入理解叙事研究在比较教育中的应用。

### 1. 对王承绪的叙事研究<sup>[10]</sup>

许美德于1983年和2001年两次与王承绪相见。在撰写关于王承绪的故事时,分为了浙江大学校史和王承绪的经历两个部分。浙大的前身是1897年林启在杭州创办的求是书院,在新

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浙江大学按苏联模式被拆分成了多所单科性大学,部分系科并入省外兄弟院校,其中留在杭州的院系被拆分成了四所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此四校于1998年再次合并成为一所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同样是按照时间线,许美德从以下几个方面叙述了王承绪的人生故事:生长在江苏;大学教育和早期生涯;在英国留学:1938-1947;社会主义时期教育生涯;改革开放后教育科学的春天;在中国和英语世界之间架桥的一生。除了早年生活,王承绪的人生都与浙大校史和留学经历息息相关。王承绪在留英归国后翻译了许多欧洲和北美教育名著,在改革开放后开辟了比较教育领域,与朱勃和顾明远合编当代中国比较教育经典教科书《比较教育》,积极寻求与国内外比较教育研究者的密切合作,并组织翻译了一系列比较高等教育名著。许美德通过这样一种叙事研究的方式将王承绪的生平与教育经历娓娓道来,从其经历中可以体会和发现中国大学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 2. 对顾明远的叙事研究<sup>[11]</sup>

在1989-1995年,许美德与顾明远曾有长达6年的紧密合作,两人分别作为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与国内众多师范高校合作项目的负责人。与对其他学者的研究一致,许美德仍然是从顾明远所就读和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开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为创办于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1923年发展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大学。在1931年和1952年有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先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北京师范大学成为教师教育的全国典范。同样是按照时间线,许美德从以下几个方面叙述了顾明远的人生故事:在江苏南部的成长故事;留学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学术生涯;文化传统和中国教育思想;变革时代的比较教育学者。顾明远的比较教育研究一方面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现代化,另一方面也立足于教育与文化的全球视野。顾明远在国内外所出版的教育著作对中

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顾明远在1979年领导创建了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并在1983-2002年间担任主席,在2000年当选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许美德通过刻画11位教育家的成长历程、事业发展与学术贡献,也生动再现了中国近百年来政治、文化与社会变迁,并从家庭教育、性别与教育、学校教育、求学和任职的大学以及外来影响等影响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探讨。在许美德看来,这些教育家的人生故事就是“活生生的儒学著作”,透过教育家们的“肖像”,感受他们的生活经历与理想追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他们的影响,而他们的人生故事以及他们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不仅可以激励来者,而且可以丰富21世纪的全球教育对话。

## 三、案例研究的应用

### (一) 将案例研究运用于比较教育

案例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普遍应用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美国学者罗伯特·殷(Robert Yin)在《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一书中将案例研究视为一种实证研究,即是在不脱离现实生活环境的情况下研究当前正在进行的现象,关注事件的前后联系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高度关联,其研究过程涵盖了设计的逻辑、资料搜集技术以及具体的资料分析手段。案例研究的优势是,可以使研究者原汁原味地保留现实生活有意义的特征——譬如个人生命周期、组织管理过程、社区变化、国际关系以及某个产业的发展过程等。<sup>[12]</sup>针对回答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他将案例研究区分为探索性、描述性和解释性三种类型。

案例研究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在案例研究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比较教育学者是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他非常擅长使用案例研究去探索和解释国际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发展。他在《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一书中选取了欧洲五所创业型大学,收集了这些大学的历史与现代发展的文献,对学校各级领导进行了访

谈,对学校的管理实践、课程和研究上的创新与举措进行了观察,最终形成了创业型大学形成条件的扎根理论。克拉克所进行的案例研究,既是探索性和描述性的,也是解释性的。他通过案例探索和确认逐渐生成了“创业型大学”的概念,通过描述每个案例大学的特色以强调体现其中的创新举措,进而解释了使创业型大学成为可能的那些管理、组织结构以及供给等几方面的变化。克拉克思路开阔的案例研究给予许美德的启示是:要认真倾听和仔细观察,避免把先入为主的理论假设强加于研究。此外,克拉克的研究也启示了校史和地理因素的重要性。<sup>[13]</sup>

## (二) 研究进程:三个研究问题的提出

许美德有代表性的案例研究主要是基于在2005年获得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资助的一个项目——“中国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公民社会和全球文化对话的意义”。如果说克拉克在研究中关注的中心概念是“创业型大学”,那么许美德的中心概念则是21世纪中国高校的新兴精神和它们共同拥有的精神文化特性。在此项目中,许美德和她的团队成员李军、林静、查强等提出了三个研究问题:(1)在迈向全球舞台的过程中,中国大学从自己的文明中汲取了什么样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又是如何影响其行动的?(2)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如何促进中国文明中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形式的发展的?(3)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有何影响?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和教育质量的结果如何?<sup>[14]</sup>

在遵循差异与共点并存的原则下,许美德和她的团队选取了12所大学作为案例对象进行分析,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3所综合性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延边大学等3所师范类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3所科技大学,以及黄河科技学院、西安外事学院、江西科技学院等3所民办大学。这12所大学的排名都相对靠前,尤其是所选取的民办大学是为数不多已被中国政府承认能够授予国家认可学位的民办大学,这些大学在地理位置、学校类型和学

校历史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在研究中,许美德主要采用四种数据类型:(1)文献资料,例如院校使命、战略规划和校史等;(2)基础数据,包括1990-2005年招生规模、师资阵容、资金来源、课程变化和学位授予等多方面的数据资料;(3)访谈数据,主要是团队于2007-2008年在大学内进行的短期调研活动,包括对大学领导的访谈以及和选定的教师和学生所进行的焦点小组访谈;(4)观察数据,包括校园照片等。<sup>[15]</sup>此外,因为整个团队成员来自北美,为使研究更为真实可信,团队在每一所案例大学都邀请了1位高等教育研究者来参与整个过程,并合作撰写所在大学的相关文献资料。

## (三) 研究成果:描绘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中国大学肖像

许美德的案例研究成果体现在她和她的团队所著的《21世纪中国大学肖像: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型》一书中。该书从学生、教师、领导者和机构变化等多个角度刻画与比较了12个类型迥异的个案,深度剖析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文化脉络、组织转型和全球挑战,展现了有着多样化选择路径的大学立体肖像。研究采用马丁·特罗(Martin Trow)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该书首先从政策层面解读中国大众化高等教育政策的决策基础与政策实施,然后通过问卷调查从学生的视角呈现学生的入学和就学体验以及对大学组织变化的看法——证实了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也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机会的显著不平等,在此基础上深入呈现了12个案例大学,最后对中国大学的新兴模式问题进行了讨论。

基于北京大学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且一直是引领中国文化的一面旗帜,本文在此以北京大学为例呈现许美德的案例研究。北京大学相关研究成果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是利用相关文献讲述北大的历史沿革。一方面是历史的变迁,包括从晚清的京师大学堂到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北京大学”,以及1937年后和清华、南开共建的西南联大;另一方面是蔡元培和马寅初对北大精神的塑造以及不同校长带领下的北大精神的延续。

第二部分是基础数据出发描述大众化进程中的北大。从在校学生数据变化中可以看到北大扩招的程度,从财务数据可以看到经费收入的增长、捐赠收入的增长以及教职工工资的增长;从学科设置沿革可以看到传统和革新的结合。第三至第五部分主要是基于对北大领导、教师和学生的访谈研究。无论是对学校领导人的访谈还是对教师与学生的座谈,可以看到北大人对北大精神的认同感和对北大荣誉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从北大领导身上,可以看到明显的学者气息和维护大学自治、推动国家政治更大变革以实现大学法人地位的责任。在教师方面,教师规模没有随着高校扩招而增加,在对11位教师的座谈中讨论了合并问题、课改和成人教育、教育平等问题。在对11名学生的座谈中,他们积极讨论了北大精神和中国文化以及社会责任和参与。<sup>[16]</sup>

#### 四、许美德的比较教育研究的核心视角

对许美德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探寻也是一场发现和对话之旅。在文献阅读过程中,发现了许美德的三个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由此提出的三个研究问题是:每一个研究方法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运用于比较教育的?许美德的研究进程如何?许美德的研究成果是什么?许美德教授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为我们一一答疑解惑。为使本研究更为细致、具体、真实和可信,本文基于“文本”力图从“当事人的视角”如实“描绘”和“还原”许美德对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运用。许美德把理想类型、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运用于比较教育研究,为我们展示了可资借鉴的独特而富有魅力且纵横交织的研究视角。理解和体会许美德的这些研究视角,有助于提升我们的比较教育研究能力。

##### (一) 中国文化视角

许美德是横跨东西文化的使者和桥梁,她作为外国学者能够对中国高等教育有着如此深入的研究,是与她的中国情结和人生故事紧密相连的。在1975年许美德开始在香港大学攻读教育资格证书之际,她因此发现了比较教育这一领域,并意识到这一拥有多学科特征的领域

可能会提供一个视角,帮助她了解并向别人解释在教育模式和传统上都与西方迥异的中国文明。<sup>[17]</sup>在20世纪,比较教育一直是“以欧美为中心”的,然而,许美德的研究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视角的研究。许美德比较教育研究的关键词即是“中国”、“比较教育”、“高等教育”、“教师教育”、“文化”、“文明”和“贡献”。许美德认为中国比较教育要获得新的发展,一方面要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各国真正了解中国教育的传统和现实,了解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历史和发展,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中国如何为世界比较教育作出贡献。她提出在当前文明的对话时期,中国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无疑可以看成是一份世界遗产,进而使世界各地的教育家从中受益。她对中国教育家的叙事研究,即是“从比较的角度思考这份遗产的哪些内涵是值得全球教育家共同分享的公共资源”<sup>[18]</sup>。

##### (二) 多学科多方法视角

比较教育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学科,这客观上需要合理借鉴其他学科或领域的研究方法,以便于从不同角度揭示日益复杂的教育现象和问题。当前,多学科方法的运用是世界比较教育的发展趋势,但这在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例如研究者更倾向于使用单一的文献研究,至于质的研究(包含叙事研究、案例研究、扎根理论、现象学研究、民族志研究等)还很少使用。如前所述,许美德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主要运用理想类型、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等三种方法,在对世界秩序模式规划理论的应用,对知名教育家的思想肖像的刻画,以及对21世纪中国大学肖像的描绘,都体现出了对突破比较教育常规范式的大胆尝试与创新。而且,她所使用的这几种研究方法也常常是紧密交织和互相渗透的,例如,她在《理想类型在比较教育中的运用:个人的反思》这一论文中,主线是以叙述的方式以自己为个案娓娓道来她在三个不同研究阶段中是如何思考和使用理想类型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不妨把它看作是一项包含了理想类型、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整合性研究。许美德的研究启示我们,比较教育研究者应不断扩充多学科视野,并建立

起更加广泛的研究方法网络体系。

### (三) 历史 - 现实 - 未来的时间视角

许美德提出可以把教育学看成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深深扎根于国家、地域或地方社区的历史经验，试图理解各种教育制度与实践，也就是说，它总是通过向历史回溯，以求穿透眼前的各种教育表象。<sup>[19]</sup>同时，在此基础上她也直指未来的向度，关注中国教育的未来发展。这实质是一个历史 - 现实 - 未来的时间取向。回首历史，是为了反观现实，更是为了瞻望未来。以许美德叙事研究为例，许美德有关中国当代知名教育家的思想肖像，即是通过个人和所在大学的发展历程呈现了教育家们的教育使命和坚定信念，勾画了近百年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图景，精彩诠释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根基和价值以及教育理念，也表达了中国教育在未来文明对话的全球社会所能提供的教益和贡献。

### (四) 当事人视角

叙事研究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促使当代比较教育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关注微观层面的教育现象，并把视角转向教育过程本身。叙事研究抓住人类经验的故事性特征，并用故事的形式来呈现研究结果，其在本质上是寻找一种能够更好呈现乃至穿透现象的语言方式或理论方式，通过当事人的视角对事件进行理解和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对概念和理论的冷冰冰的说明和灌输。这也诚如丁刚在《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总序中所指出的，“在事实描述阶段就对语言进行刻意的理论加工，必然会扭曲日常生活事实的本来面貌。叙事研究由于读者的进入并与文本中的事实进行对话，却可以使文本逐渐接近真实，而要保证读者可以对话，就需要使用读者习惯的生活语言。”<sup>[20]</sup>可以看出，这种关注当事人的视角，其实也就是关注读者的视角。许美德在叙事研究中以深入浅出的表达和孜孜不倦的耕耘，做出了对比较教育来说令人瞩目的贡献。在对教育家的叙事研究中，她把各教育家放到动荡的社会和教育变革背景之中，由此，中国教育变革的许多故事均会出现在她所讲述的故事中。

而在向她讲述生活和教育经历的过程中，各教育家表达了各自心中的教育使命，其人生意义也一并得以揭示。从他们的教育经历和教育理想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蕴藏的宝贵财富。如此注重过程的研究，如此关注当事人的视角，给予作为读者的我们的是更为生动、感动和震撼的永恒。

### 参考文献：

- [1] Max Weber. Sociological Writings [M]. Ed. Wolf Heydebrand. New York : Continuum, 1994: 266.
- [2] Brian Holm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 Some Considerations of Method [M]. London :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1: 111-175.
- [3][4][5] Ruth Hayhoe. The Use of Ideal Typ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 A Personal Reflection [J].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07(2): 194, 197, 199-202.
- [6] 卡伦·芒迪, 凯西·比克莫尔, 许美德, 梅甘·马登, 凯瑟琳·马德基德. 比较与国际教育导论：教师面临的问题 [M]. 徐辉, 朱红, 王正青主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9: 23-42.
- [7][8][9] Ruth Hayhoe. Ten Lives in mine : Creating Portraits of Influential Chinese Educator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2004(41): 329, 330, 330-331.
- [10][11][18][20] 许美德. 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 [M]. 北京：教育科技出版社, 2008: 22-45, 175-197, 1, 1.
- [12] 罗伯特·K. 殷.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 [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4: 4-25.
- [13][14][15] Ruth Hayhoe. Reflections on the Case Studies for China's Mov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CIES), 2007: 10-12, 1, 6.
- [16] 许美德, 李军, 林静, 查强. 21 世纪中国大学肖像：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型 [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53-80.
- [17] Ruth Hayhoe. China Through the Lens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 The Selected Works of Ruth Hayhoe [M]. Oxford: Routledge, 2015: 2.
- [19] 许美德. 为什么研究中国教育? [A] 丁钢.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3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3.

(下转第22页)

## From “Disembodied” to “Embodied”: On Paradigm Shift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hina

ZHAO Mengcheng XU Chengp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has followed a remarkable paradigm characterized as disembodied and disembodiment. The popular paradigm has resulted the research in some dangers, including the prevalence of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being resulted not from fieldwork but the text materials or some superficial experiences from one or more foreign trips, the more attentions being paid to the grand narrative and the utensil study but less to the specific educational life, and the tendency of “Bringing Principle” in coming to conclusions and utilizing the conclusions and so on. The theory of embodied cognition has great enlightenment to promoting the paradigm shift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and solving dangerous difficulties discussed above. Embodied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will help the researchers to produce much more lively comparative education knowledge with rich tacit meanings, and help the users to choose and use more appropriate knowledge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our own education lif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searchers’ quality, the in-depth and extensive fieldwork to real educational life, will be the important ways to promote the paradigm shift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from “disembodied” to “embodied”.

**Key word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paradigm shift; embodied cognition; education life

本文责编: 曾晓洁

.....  
(上接第 14 页)

## Ruth Hayho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Methods and Its Core Perspectives

YANG Chunmei, SUN Mengsi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Professor Ruth Hayhoe is a well-known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a professor at the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 Canada.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methods typically used by Ruth Hayhoe are the ideal types, narrative studies and case studies, which are represented by her framework of ideal type of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higher education, narrative study in Chinese well-known educators, and case study of Chinese mass higher educ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mparativ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 research methods.

**Key words:** Ruth Hayhoe; ideal type; narrative study; case study; comparative education

本文责编: 曾晓洁